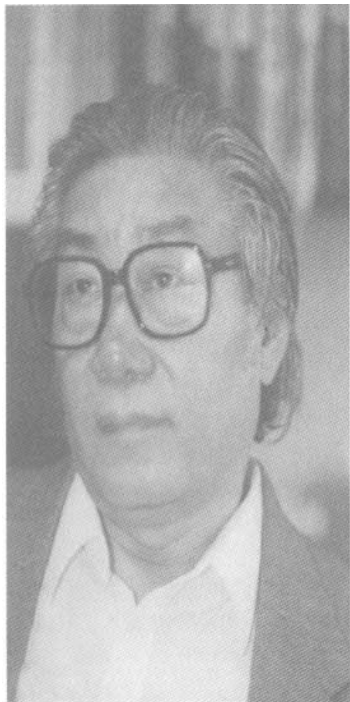


■◆陈池瑜

张道一艺术学思想研究



张道一先生近照

编者按：

张道一先生是我国著名艺术学家和民艺学家，早年从事工艺美术的设计与研究，对于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潜心研究了三十余年，以后开拓了研究领域，为我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和民艺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张先生现在是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华美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艺术家评委、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在东南大学领衔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综合研究艺术的艺术学系。今年是张先生70华诞及从艺50年，本刊特刊选了几位国内著名学者研究张先生的文章，以表祝贺。

张道一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学家、美术学家和工艺美术史论家，是美术学与艺术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张先生在东南大学于1994年6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主编了《艺术学研究》丛刊和《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并主编了《艺术学研究》丛书，致力于艺术学学科的发展。1998年张先生又在东南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点，培养艺术学研究高级人才。张先生为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当代艺术学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张道一先生致力于艺术学学科的创立和建设，首先也遇到一个正其名的问题。我国原来的学科和专业目录上没有“艺术学”，经张先生和学科评议组专家们共同努力，将艺术学列为一级学科，同时艺术学还同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学等并列列为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这样艺术学建立博士点和硕士点才有了“户口”之依据。艺术学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确认后，对这个学科的成长和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张先生一方面呼吁国家设立艺术学学科，另一方面在东南大学创立艺术学系。张先生认为，成立艺术学系后，在实践中便建立了艺术学教学和科研基地，可以培养艺术学教学与科研人才。1994年6月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在东南大学宣告成立，拉开了在大学进行艺术学教学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艺术学系，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学研究所，可以说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带动了我国艺术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艺术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应该加强其学科的整体研究。张先生认为，以往我国有关艺术学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即研究某个分支，如美术学、音乐学等，对于艺术的共性、特点、规律和社会功能等，则缺少综合的、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将艺术史和艺术学看成是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我国一直空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成立填补了这一空白，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大学中艺术学学科的建立。艺术学学科在综合大学发展，张先生认为将会显示出她的优势和特点，并可以同艺术院校的门类艺术史论的教学形成互补关系，有益于我国的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学。在国际上我国综合大学的艺术学系亦可与国外综合大学艺术学系、艺术史系建立联系，增加学术交流。我们认为，张道一先生创办和领导的艺术学系，在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中也是一项有益的新的举措。张先生经常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艺术学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加强艺术理论的研究，使艺术实践活动又多了一个层面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还可以在综合大学各专业开设艺术选修课，又增加了一个进行美育的渠道。张先生设置的艺术学系的教学任务，一是培养艺术学学科博士生和硕士生，二是设立应用技艺型专业，如工业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培养本科生。张先生还建议今后也要增设“艺术学”本科专业，在本科这一层面上培养艺术学人才。

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成立后，为了推动艺术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加强艺术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张道一先生主编了大型学术丛刊《艺术学研究》及主编了“艺术学研究”丛书，在学术界引起良好反应。1999年4月30日晚上，我去张先生家拜访，张先生谈到，办杂志十分重要，特别是人文科学，只有办杂志才能提供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推动学科发展。在经费困难、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张先生经

多方努力,终于使他主编的《艺术学研究》第一集于1995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在“编后记”中写到:“不论是自己还是在交往当中,都深感艺术理论的重要和不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要发展,要繁荣,怎能离开理论的指导呢!即使困难,也得有人去做,首先需要精神上的支撑。我们希望《艺术学研究》能够继续下去,更祈盼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不要使他‘空前绝后’,成为‘海内孤本’。”《艺术学研究》共出版两期,受到钱学森、王朝闻等专家和读者的好评,所发表的文章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原理研究、民艺学、设计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诗学、汉字艺术与中国图案学、音乐美学、舞蹈学与戏剧史论等,从这些文章内容亦可看出主编者张道一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

张道一先生作为艺术学学科带头人,对于学科既具有前瞻意识,同时对艺术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亦十分重视。他多次谈到东南大学艺术学研究要实行“三环”战略,“一环”即以艺术学系为教学和科研基地,“二环”可以聘请美学、艺术学各分支学科专家包括退休老专家作客座教授,例如他们就聘请了美学家汝信研究员、音乐美学家茅原教授作客座教授,“三环”即请各个学科的专家作“大讲座”,包括哲学、科学、历史、经济、计算机等学科的专家都可以请他们给艺术学科师生和研究人员作讲座。张先生认为人文科学必须要有综合素质和学术信息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

张先生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还认为人不能离开艺术,社会不能没有艺术。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文化活动。他对艺术学的基本看法是:“艺术学则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学科。没有艺术的活动和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但若只有艺术的创作、设计、表演和演奏,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应该建立“艺术学”》,载《艺术学研究》第一集)

长期以来,艺术界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和重技艺、轻研究的状况,造成了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失衡。张先生认为,说“理论是灰色的”只能说明对实践的重视,并非说理论应该落后于实践。“实践出理论”,也不是说实践多了高了,也就会自然产生出理论,这是一种误解。张先生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实践的高层次有助于理论的提高,大艺术家的一些独到的心得、见解和经验,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艺术的真谛,弥足珍贵。然而,理论是由个别到一般的上升,它要进入人文科学的境界,没有更大的提炼和概括是不可能的。艺术在我国的人文科学中应该找到自己的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系着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关系着民族文化的提高。”

张先生十分重视艺术理论的教育工作,认为“关键在于教

育”。他在回顾20世纪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后,在总结经验和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艺术教育结构上的一个缺陷,即在实践和理论这一关系上,艺术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不足。张先生指出:

也就是说,在技艺性的训练上成绩最大,都是侧重于创作、设计、表演、演奏的教学,一般所开设的史论课,多是为前者增加知识和修养。虽然有少数几所学院设立了有关美术、音乐史论的系科,也只是分别进行。对于艺术的客观考察,整体研究,综合地探讨它的共性和规律,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进行配列设施,在艺术教学中则一直阙如。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的专业目录和国家学科目录中,就成了一个缺门。譬如说,在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属于“文学类”,但只是一个“一级学科”的总名,用来概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舞蹈等“二级学科(专业)”,而缺少实在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这样,对艺术进行客观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就无法定位。如果同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相比,显然是不完整的(其严重性是缺少带头的理论学科)。(《应该建立“艺术学”》)

我国最初在大学中分科,只有“文史哲”,有“文”无“艺”,将“文艺”拆开了,好像艺术就是跳舞、唱歌、画画,谈不上什么“艺术科学”。对这一现象,张先生深感痛惜,因而他有一种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我们应该有所超越,我们应该建立起现代的“艺术学”,在探讨艺术的共性与个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国的特色。张先生的这一设想,通过创办艺术学系得到了具体实施。张道一先生认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艺术学的研究,设在综合性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它可以与其他多种文科相互影响,也可以与自然科学沟通。由于艺术学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又属于人文科学的理论范畴,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综合大学的艺术学系与艺术院校便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并产生互补的关系,这无疑对于我国的艺术事业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艺术学系的过程中,张先生就开始考虑和构想艺术学研究框架,建立艺术学学科群,使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张先生认为,在艺术的各部门,即在音乐、美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舞蹈等门类的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须着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其共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使之进入人文科学。他对艺术学学科自身研究内容或艺术学主干学科的设想是应该建立九个方面的基础学科,即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学、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民间艺术学等,这样九个分支学科只是侧重,不是分割,在各方面之间同样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张先生还积极主张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姻,如和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思维学、文化学结合,形成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张先生提出至少可以建立以下学科,即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

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十一个学科。张先生预见,随着艺术学的深入研究和逐渐拓展,以及若干分支学科的建立,必将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大门类;而艺术学的建立,又给艺术实践本身以科学指导,促进艺术的繁荣。

张先生虽然设计了艺术学学科群的构架,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艰难性,他认为,由于艺术学自身的建设有待完备,在横向发展的交叉学科上就显得更为艰巨,因此,在整体规划下有先有后地进行学科建设是必要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张先生经多方面努力,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一套由张先生主编及由东南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编辑的《艺术学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西方美学与艺术学摘英》、《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艺术与真理》、《未完成音乐美学》等专著。张先生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指出:“要建立艺术学是很不容易的,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奏效,也不是一两个能够完成的。组织上的保证和机构的设立只是一些条件,而艺术学学科能否独立起来,则主要看学术的力量及其研究的成果。”“艺术学的建立,需要一大批有志者的努力和奉献。”张先生主编这套《艺术学研究》丛书,其目的就是要促进艺术学学科建设,为出版艺术学研究专著提供条件。他还设定编辑这套丛书的三个“并举”即选题要求,这就是:1.综合性的艺术研究与艺术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并举;2.艺术自身的研究与艺术和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并举;3.艺术的共性研究与中国艺术的特性研究并举。

张先生对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他现在虽已年过花甲,但仍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呼号奔走,并克服重重困难出版《艺术学研究》、《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及主编《艺术学

研究》丛书,领导艺术学系和艺术学研究所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工作,主办高层次的艺术学研讨会议,指导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每一项工作都要耗去先生极大的精力,可以说先生将自己的生命和心血都灌注在艺术学学科上,这是为艺术界和学术界尤为敬佩的。他的艺术学思想及他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对我们艺术学研究后学来说,必将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张先生曾于1997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专文《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在此文中他回顾了当代中国艺术学的建立过程,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他主张将艺术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技法性”的理论,如美术的构图学、色彩学、解剖学、透视学以及图案学、平面构成、立体构成等,这个层次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层次是“创造性”的理论,即创作方法论的研究,揭示创作过程中的规律;第三个层次是“原理性”的理论,这是经过高度概括的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有关艺术的基本原理。张先生认为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没有前者后者做不实,没有后者前者搞不透。张先生谈到,中国的艺术学学科经过同仁们几年的努力,已正在建立之中,他对“中国艺术学”的解释是,一指中国的艺术学,二指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三指中国艺术之学。中国艺术学,它既是中国的,中国人所做的,也是中国艺术的,所谓“中国的艺术学”,并非是地域性的艺术学,“中国的艺术学”不但要建立起来,而且要进入世界之林。

张先生的艺术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十分丰富,博大精深,本文只能取一两个片断加以评述,算是自己学习张先生思想的体会吧。

(陈池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

■◆张晓凌

张道一的学术敏感

时下中国所谓做学问的,凡有三类,一是足不出户,全知天下事者。此种学者,在书海钩沉,触类旁通,于典籍、校注、考订、目录文献辨别真伪上自见深厚功力,可谓大学问家,有人讥为“吊书袋者”,虽为不恭,但也算一种意见。不食人间烟火对具有使命感的学问人来说算不上是一种好的选择,所以为现今大多数学者所不取。二是对各类历史及现实问题作哲学思考者,对各类问题能机杼独出,见解超凡,喜欢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需要时也可旁引博征,比较中西,一时名重。据有见地的人说,中国的思想家要在下个世纪方能临世,所以,此类学者也只能算上半个思想家。三是一二浮躁小子,机锋逼人,观点骇人,只求轰动,不管正果,一触实际,便凌虚蹈空而不知所终。据实而论,张道一先生哪一类也算不上,因为他虽然伏案数十年,却无丝毫迂腐气。他数年如一日地坚持田野考察,忽而西北高原,忽而西南边陲,自有一种做人的豪气,是为至性至情之人。所以,说他是集书斋型和田野考察型为一体的学者,恐不为过。他在工艺文化的哲学思考上成就卓著,有专著数部,同时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践家,主编和亲手绘制《中国图案大系》可谓洋洋大观;他的学问既带有纯学术的色彩,又是能加以验证的经世之学。在工艺文化理论的建设上,一时无出其右者。倘若究其学术特点,恐非一二文章所能道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学术上的敏感。

对美术发生学,我曾经作过一些浮泛的研究。专著的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才读到张先生的观点,深为其平实明了而又独具睿智的看法所折服。对有关艺术起源各种著名的理论,张先生认为,它们各在自己的切入点上成为一家之说,但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先生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事实上是看出了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的失误之处。比如巫术说,国外的一些大学者如卢卡契、S·雷纳克、H·布勒伊等都加以肯定。不错,巫术作为原始人成熟的宇宙观,其对艺术的起源的确举足轻重,但却不是艺术发生的最早源